

明
清
小
说
与
中
国
文
化



MING QING

XIAO SHUO YU

ZHONG GUO WEN HUA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圣著

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

吴圣昔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南京

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

吴圣昔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丹阳市文教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212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305-01203-3/I·91

定价：5.50元

目 录

一 总论

- 一 中国文化是明清小说的母体 (3)
- 二 明清小说的文化特征 (14)
- 三 明清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21)

二 分论

- 一 精神支柱和思想枷锁的双重效应
 - 明清小说和儒学 (29)
- 二 宗教神祇和艺术圣女自由拥抱的结晶
 - 明清小说和宗教 (57)
- 三 古代士子奔向理想王国的独木桥录相
 - 明清小说和科举 (100)
- 四 追求法治的朦胧诗
 - 明清小说和法 (132)

五	为巾帼扭曲灵魂谱唱的老调、变调和乖调 ——明清小说和女性	(154)
六	苦难生灵自我慰藉的救世英雄像 ——明清小说和侠	(178)
七	向命运之神膜拜、戏谑和挑战的合奏 ——明清小说和星相占卜	(202)
八	心路幻影的彩照 ——明清小说和梦	(221)
九	民间风情的艺术画卷 ——明清小说和民俗	(252)
十	彩笔绘出江山美 ——明清小说和旅游	(269)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一 总论

一、中国文化是明清小说的母体

明清时期的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继唐诗、宋词、元曲以后的又一个巍巍高峰。异彩纷呈的明清小说，无疑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骄傲。翻遍世界的文明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小说，能与中国明清小说的繁荣和丰富的状况相匹敌。当然，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小说艺术，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创性特点；但是，象中国明清小说那样辉煌灿烂，却为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小说史所望尘莫及。明清小说在自己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既奇峰突起般先后涌现过许多部煌煌巨著；同时，围绕着这些巨著，又产生了无数的作品，象捧月的众星那样，遍布于小说园地，汇成了一座举世瞩目的巨大宝库，成为中国人民最光辉的历史遗产之一，永远留传于世。

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得天独厚般获得如此丰硕的小说遗产呢？我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加以说明；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则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文化的培育。没有源远流长的中国古文化的孕育，我们不妨说，便没有丰硕辉煌的明清小说；中国的古代文化，就是明清小说的母体。当然，这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也许会使人感到缺少理论的严密性；但是，它生动地说明了二者关系的密切及其蕴含的实质。

1. 明清小说在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场中孕育和发展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明清小说发生发展的母体呢？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和消亡，发展和衰退，都是多种有关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明清小说作为一个历史时代文学发展的主潮

流，它的孕育和出现，它的发展和形成，它的诸种特性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具有规律性的原因可寻的。从小说或文学的内部关系来说，它们无可怀疑地都必然要给明清小说以特定的影响，为明清小说充分准备了得以诞生的内部文化条件；而从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礼俗、学术思想、伦理观念、科学技术、文教体育以及游戏娱乐等等外部各种因素来说，它们也无可怀疑地都必然要给明清小说以特定的作用，为明清小说构成了得以发展的外部文化背景。同时，作为创作主体的明清小说家，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创作思想、审美观念、创作活动和创作方法，也始终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所提供的文化条件的制约，莫不接受特定的社会文化素质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陶冶。所以，不论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局部来说，明清小说都是与各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由它们相互融会或撞击所造成；而这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多种因素的融会和撞击，实际上就是凝聚成为一个效应强烈和奇特的文化“场”。明清小说就是在这个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场”的作用中发生和发展，就是在这个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场”的作用中孕育和形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流。这就表明：说中国文化是明清小说发生发展的母体，不但非常形象，而且十分贴切。

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作为母体，是它决定了明清小说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特性。

2. 中国文化对明清小说积极作用的具体表现

我在前文指出：没有源远流长的中国古文化的孕育，便没有丰硕辉煌的明清小说。在明清小说发展成为一代文学之高峰的过程中，文化母体发挥了不可缺少和不可低估的促进

和推动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说不可缺少呢？因为没有中国文化的促进，明清小说就不可能如此蓬勃地发展；又为什么说不可低估呢？因为没有中国文化的推动，明清小说就不可能发展为一代文学的高峰。这是我们从文化视角研究明清小说时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命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却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归根结蒂导源于两方面的认识：其一是对中国文化的总的估价有分歧，极端者竟认为那些东西只是一堆过时的封建性糟粕，因此要加以全面否定和摒弃；其二是对明清小说的总的估价也有分歧，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认为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货色。基于这样的认识，得出中国文化和明清小说之间只能存在一种负效应的关系，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即：封建性的中国旧文化催生出的明清小说都是低级庸俗的货色。然而，如果我们客观地加以评价，这种积极作用显然是存在着的。我们从如下四个具体方面略加说明，就可见其一斑。

首先，明清小说在其发展成为一代文学之高峰的过程中，受到古代中华的生活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育；明清小说是古代中华生活文化和历史文化所共同熔铸而成的明清文坛的时代骄儿。如果说，生活文化是明清小说借以孕育和生存的肥沃土壤，那么，历史文化就是明清小说得以成长的滋润雨露和熙和阳光。明清小说艺术形象的总体图景和人物系列足以证明，它不仅广泛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生活文化的生动而丰富的特有景象，而且又深入地体现了古代中华历史文化的辉煌而具体的真实面貌；古代中华的生活文化和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内容，不但给明清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有民族气质和民族特色的描写材料，而且，传统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具有文化素养的小说作

家，使他们有才能在小说创作中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作出艺术描绘和深刻的审美评价。正因为如此，人们每每把明清小说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确，历代的民族祖先们披荆斩棘地前进的步伐及其战天斗地创造古文明、追求美好未来的动人业绩及其心灵的搏动，固然是明清小说艺术形象和谐旋律中的时代强音；他们在前进过程中迭遭的颠沛、艰辛以致失败时所流洒的血和泪，也同样在明清小说艺术形象所蕴蓄的感情潜流中击起过阵阵波涛。古代中华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上至帝王、官宦，下至被压迫被侮辱的底层群众，不论是得意者、失意人，还是弄潮儿或落伍者，他们或追求、呐喊，或挣扎、彷徨，或踌躇满志，或消沉厌世，都象走马灯似地在明清小说人物画廊中出现。作品所反映的那无所不包的生活浪花：无论是京华大观园莺歌燕舞中隐伏着的难解纠葛，还是古金陵十里秦淮之夜醉生梦死的丝竹悠扬；也无论是那雪夜里草料场的一场大火如何点燃了一个被迫害的善良者的复仇心理，还是那烽火连天的古战场上为图霸业的无休无止的拼杀，或是那西行取经时漫漫古道上一场又一场腾挪变化的斗法，还有那在古运河急匆匆行船旨在寻求发财和功名机会的诸般理想，不但都与古代不同层次生民的文化心理相共振，泛溢出无比浓郁的中华大地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而且通过多种多样格调的艺术描绘，提出无数不同内含和不同层次的人生课题，诸如有关历史兴亡、社会未来、人类命运、宗教奥秘、伦理观念、风情习尚……莫不使人们获得丰富启示和引出深深的遐想！显然，这种种，都与古代中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明清小说之所以民族特色是那样的鲜明，生活气息是那样的浓烈，文化素质是那样的深厚，探求

其中的深层奥秘，很关键的一条，如果离开古代中华生活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积极作用，便将不可理解。

其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哺育下，明清小说的形象体系中充溢着富有真善美和时代意义的高亢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可以说是明清小说成为一个时代文学高峰的灵魂。撮其要者，表现有四：其一是张扬正义、讴歌进取的精神。何谓正义、进取？其内含或有模糊性；但是，我们如果联系明清小说的形象实际来探析，其意义显然是明确的。在明清小说的艺术形象描绘中，那些或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捍卫民族利益和民族生存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或遇不平事，为反对暴虐和强权，援救被迫害者而不计自身安危，挺身抗争；或为不堪忍受苦难生活的折磨揭竿而起；或为人伸雪冤屈，甘冒斧钺而仗义相助等等，非正义而何？尽管这种行为，或为纲常不许，或与当局抵牾，但明清小说多有以由衷赞美的笔调，加以张扬。又或为某一理想，不怕崎岖曲折百折不挠地去争取；或为摆脱身处的困境和危难，甘愿呕心沥血去奋发；或为自己的特定目标，不惜浪迹江湖甚至扬帆海外去寻获；或为实现忧国爱民的远大抱负，坚持不懈去进击等等，虽有为群为己之别，或层次不同之异，但非进取而何？明清小说莫不给以由衷的讴歌。明清小说正因为有一股张扬正义，讴歌进取的精神，所以显示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意蕴。其二是针砭时弊、驰神未来的精神。或敢批逆鳞，以极其犀利的笔锋，揭露政治舞台和宫廷官场的种种丑闻，以显示其行将没落而无可挽救的颓势；或洞幽察微，以无比真实的格调，反映社会生活中蕴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们于无声处听得阵阵惊雷；或描写一个家庭的兴衰，以预示封建大厦之将倾；或刻画某些人物在特定

环境下灵魂的堕落，以诅咒封建秩序的必然崩溃；或表现某种理想境界，寄希望于美好未来。从总体上看，这一切，不但汇集成一股战斗性，使明清小说对当时社会保持和采取了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势；而且，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形象世界里或明或隐地寄托着作家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建构和企盼。这就不但给人以振奋和鼓舞，而且启迪人们去幻想，去追求。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晚清时期，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一部分作品表现了未来中国的构思；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固然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范畴，但给大转变时期的民众带来了催促社会改革的新声，可说在稗坛形成一种新格。其三是劝善惩恶，嫉恶如仇的精神。劝善惩恶，既是儒家传统观念，也是佛道二教的教义，明清小说中的表现，当然不可能与其无关，但又不完全囿于其立意。劝善惩恶不但是一种衡量作品社会效益的普遍价值取向，而且还是作家创作思想中所普遍遵循和乐于贯彻的指导原则。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千百部明清小说的形象体系及其内在特征中，这种劝善惩恶的精神，既作为一种艺术思想或显或隐地始终贯穿其间，而且还往往转化成为艺术细胞，密不可分地组合进各个关键性创作环节，标志着明清小说嫉恶如仇的审美倾向的确立趋势。虽然对善恶理解，古今不同，人人殊异，但明清小说中表现的皆有其具体内容。或君王暴虐，则直斥其为“独夫”，展示其众叛亲离的情景，甚至高张“吊民伐罪”的旗帜，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进行讨伐；或奸佞乱国，则多方加以揭露，描写他虽可逞意于一时，却难免遗臭万年之可悲结局；或贪赃枉法，描写身居官位者，只图攫取不义之财，不惜颠倒是非，残害无辜，以致身败名裂，万民唾骂；它如描写谋财害命，图奸乱伦，淫人妻女，损人利己，

挑拔离间，虐待老人等等，几乎涵括军国大事，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人性品格等各个方面。反对什么，提倡什么，立意分明。对此，才高者固能把握其契机，加以深化，显示其启示性；思巧者亦可说小中能见大，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其中，善恶果报的模式虽在所难免，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亦时有体现，从而使明清小说蕴蓄着一股深层的文化蕴含。其四是寄情世俗、嘉惠里耳的精神。明清小说的世俗性是具有先天因素的。这不仅指明清小说的前身——宋元话本，主要是一种诞生于里巷的通俗性作品，其特征不可能不给明清小说以承传；而且明清小说中所反映的故事内容，也大多来自大千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创作主体赋予作品的创作主旨及其在形象体系中实际体现的意蕴，大多强调要为下层群众所欣赏和乐于接受，并引起不同频率的共振的内容；由此，创作主体在构思谋篇中也就比较注意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来体现。这是因为明清小说的创作主体，大多是一些比较接近下层群众而又比较熟悉下层群众生活的士子，他们对现实社会和现存秩序往往有不满情绪，牢骚满腹，甚而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相反，却同情下层群众，愿意以自己的作品给他们以启示，以愉悦。总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明清小说大体上都不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更不是属于正统文学的；相反，比较起来，却是属于世俗社会和下层群众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明清小说中的民主性精华，从总体上来说，较之其它文学样式的作品，以致一切经史典籍更要广泛和充分；所以，明清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相对而言，也就显得充实和突出。这正是中国文化给予明清小说以积极作用的又一个有力证明。

再次，古代中华民族文化中有关方面的独特内容及其特

殊成就，为明清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形成为文学主潮流，在客观上提供了充分优越的条件和丰富的物质准备。这里，我们特别提出如下三点：其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两项，早为大规模的刊刻小说以及为小说艺术的飞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小说和诗词歌赋有一点不同，后者可以依靠传唱而迅速流行，历史事实证明，甚至可以题句在酒楼、寺庙的壁间而传颂一时，风行四方。但是以繁富描写为特征的小说，动辄数万言，甚至上百万言，如果没有造纸术而单靠口传，如果没有印刷术而单靠手抄，许多作品就不可能既传颂于当时，又闻名于后世。资料表明，至今已知的明清时代通俗小说就有一千余种，除个别以外，均在当时已经刊行，甚至屡次翻印再版，从而在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小说就不可能成为明清文坛的主潮流，明清小说又怎能成为一代文学之高峰！其二，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客观上为小说作家队伍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从总体上说，小说家不但要有创作的才能，而且应该具有丰富的学识。在古代中国，读书未必一定为应试；但是，为了应试就一定要读书。科举制特别是八股取士，固然曾经铸造出无数头脑僵化的冬烘；不过从另一角度说，也培养出无数具有丰富学识的知识分子。有资料表明，明清小说家队伍中，除少数曾得意一时的官僚、士子以外，大多数就是富有才气，但不为当局赏识，屡试不中而落入困顿，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许多小说名著如《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及其评改者金圣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及其评改者毛宗岗、《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聊斋》作者蒲松龄等等莫不如此，甚至还有许多姓名失传的作

家，可以断言，境遇也是这样。科举制犹似古代士子奔向政治舞台的独木桥，越过这座桥，达到他们理想王国的又有几许；更多的人，则纷纷从这座独木桥上跌下来，落入了生活困顿和精神痛苦的深渊。而其中的佼佼者就从这个深渊中挣扎而出，加入了明清小说家的行列；其三，城市文化的发达和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在古代中国，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诸如长安（西安）、洛阳、汴京（开封）、临安（杭州）、金陵（南京）、北京、扬州、苏州以及后来的广州、上海等等，象星罗棋布一样出现在中华大地。这在古代世界史上是稀见的。城市中，不但人文荟萃；而且交通发达，手工业、商业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通俗小说的前身——话本，就是宋元时代在城市瓦舍等游乐场所中说话艺人演出的脚本。明清时代，不但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集中在城市里，而且，特别是小说的出版商和书店，更是主要依靠城市而生存。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城市文明是明清小说发生发展及其成为文学主潮流的摇篮。从上述三者看，它们对于明清小说的积极作用，随你怎么估计似也不会言过其实，因为离开这三者的积极作用，或者以这三者为标志的文化条件不具备，很难想象，明清小说的发展还会出现后来那样的成为一个时代文坛的主潮流。

最后，明清小说发展成为一代文学之高峰的过程中，接受了古代小说理论观念及其实践的洗礼，也可说前者是它的承传；所以，古代小说理论观念及其实践对明清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特点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人们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明清小说好象是在明清时期突然从大地上涌现出来似的。其实，明清小说的诞生及其以引人注目的不可阻挡的强大声势澎湃发展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潮流而闻

名于世，除了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以外，还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规律性。这种内在规律性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古代小说理论观念及其实践的积极作用就是其中之一。明清小说只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当然是一个无比辉煌的飞腾阶段。同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长河，不但早为明清小说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流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而且为明清小说形成自己的艺术审美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其一，陶冶了明清小说作家的小说观。古代小说理论观念及其实践所积累的理论内容和创作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明清小说家深受其熏陶，并且在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举其大端，诸如：小说是“街谈巷语”的观念，虽然，就其本意而言，流露着某种轻视小说的成份，但在客观上却揭示了小说与庙堂文学和正统文学的某些不同特性。受其影响，明清小说家不但多致力于反映世俗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生活内容，即使描写帝王将相和神仙鬼怪也往往加以世俗化；而且还大多具有为里巷中人而创作的态势，因而在创作思想和审美观念上往往力求作品内容和形式的通俗。又如：“作意好奇”的观念，爱奇好异是人类的天性，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实践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追求故事内容的奇异，这突出地表现在志怪小说方面，一是追求艺术手法的新奇，力求作品艺术上的精致、完整和引人。受其影响，明清小说家则以“非奇不传”为号召，这对推动小说创作思想艺术的提高和创新是显而易见的。又如：小说是“游戏三昧”即以文为戏的观念，以文为戏，原本是指与正统文学相对的小说创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揭示小说创作艺术手法的特殊要求。受其影响，明清小说家多有运用以文为戏的手法，以增加作品艺术形象的